



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

以西方的观点专门研究西欧的政治和社会

[美] 戴维·奥尔布赖特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

以西方的观点专门研究
西欧的政治和社会

〔美〕戴维·奥尔布赖特 编

方廷钰 沈一民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内部发行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

以西方的观点专门研究
西欧的政治和社会

[美] 戴维·奥尔布赖特 编
方廷钰 沈一民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52

1983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79 千

印数 5,900 册

印张 117/8

定价：1.5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编者系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的高级编辑戴维·奥尔布赖特。1976年，在他的主持下，一些研究人员就西欧共产主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于1979年写成本书。

本书由九篇独立的文章加导言共十篇组成。作者九人。导言部分概述西欧各国共产党在国内所处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一至八篇分别研究了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情况，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芬兰和英国的，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三国即瑞典、挪威、丹麦和附近的冰岛的共产党的状况，并简略地介绍了六十年代以后新成立的或从原有的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新党的情况。导言部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如瑞士、比利时、卢森堡、圣马力诺、荷兰、马耳他、奥地利、西柏林的共产党的情况也作了一定的叙述。

本书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内容包括党的成立的历史背景、党员构成、党员人数的消长、领导人的更迭及其背景、党的团结与分裂、与其他左翼政党的联合和分离、历年选举的成败及其原因、过去和现在的重大政策、对国际重大事件和集团的观点等等。本书还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前途作了一些预测。

对西欧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和实践，对本书作者的观点，我们应该本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立场来加以研究和评价。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本书为研究西欧共产主义提供了不少资料，故予译印，供读者参考。

目 录

前言	1
本书各篇作者简介	3
导言	戴维·E. 奥尔布赖特 5
一、意大利：意共的影响不断增长	贾科莫·萨尼 44
二、法国：法国共产党的演变	威廉·J. 戴维肖弗 91
三、西班牙：西班牙共产党与佛朗哥以后的时代	欧塞比奥·穆哈尔—莱翁 130
四、葡萄牙：葡萄牙共产党和葡萄牙革命	欧塞比奥·穆哈尔—莱翁 169
五、希腊：非西方式背景的共产主义	季米特里·基齐基斯 206
六、芬兰：芬兰共产党与选举政治	约翰·H. 霍吉森 239
七、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斗争	特龙德·吉尔伯格 263
八、大不列颠：对英国共产党来说，革命还是渐进主义	戴维·林恩·普赖斯 313
九、欧洲共产主义的挑战	克文·德夫林 326
人名译名对照表	360

前 言

编这本书的缘起相当简单。当七十年代我在《共产主义问题》编辑部工作时，深信需要一本全面考察西欧共产主义复杂现象的书。因此，当弗雷德·普雷格在1976年末首次提出要编这样一本书时，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立刻开始邀集一批撰稿人。

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实际上经过一番曲折过程。编辑这样一本书的困难在于人们以往对西欧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党几乎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更难办的是，自从打算编这本书以后，形势的发展不但更加突出这项工作的必要性，而且发展速度之快，使人难以作出最新的估计。撰稿人遇到这些困难，又加上我这个编辑紧逼着催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态度，如果我不加以称赞的话，就太疏忽了。

本书若干篇章使用了《共产主义问题》上发表过的一些材料，主要是关于意大利、葡萄牙、希腊、芬兰和各党之间关系的那几章。但是，为适合本书的需要，所有材料都经过修改和补充。

除了本书撰稿人外，还有其他许多人为本书的出版作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如我已经提到的弗雷德·普雷格促使我担负起这项任务，还以无限的耐心等待本书最后出版。罗纳德·蒂尔斯基、埃里克·威伦兹、皮奥·尤利厄西、琼·巴思·厄本、罗伯特·普特南和乔尔金·拉斯马森在许多问题上提供宝贵意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几年，曾和亚历山大·达林一起学习，他帮助我形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金伯利·约翰逊—史密斯在百忙中为我编好的许多章节并重新打

字,她的丈夫詹姆斯·史密斯在本书完成过程,以始终如一的好脾气和谅解态度,把我的负担都加在他和她的身上。

戴维·E. 奥尔布赖特

本书各篇作者简介

戴维·E. 奥尔布赖特是《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的高级编辑。他曾为许多杂志和专题论丛写过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关于苏联和中国的政治与对外政策的文章。此外，他已编成《非洲共产主义》一书，即将出版，同时他是行将问世的《求爱的窘境：苏联、中国和加纳》一书的作者。

威廉·J. 戴维肖弗是普雷स्क岛市缅因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他专门研究法国政治，尤其是法国共产党。而且，他还曾在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

克文·德夫林是慕尼黑自由欧洲电台政治分析员。他发表过大量有关欧洲共产党的报告，现在他正参加一个集体研究的项目，准备出版一本定名为《帝国和意识形态》的书。

特龙德·吉尔伯格是帕克公园，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出生在挪威，他专门研究西欧和东欧的政治，尤其是北欧各国和罗马尼亚。他关于北欧国家的著作有《苏联共产党和斯堪的纳维亚共产主义：挪威现状》等。

约翰·H. 霍奇森是锡拉丘兹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他曾写过关于苏联和芬兰的内容广泛的文章。在他关于芬兰的著作中有《芬兰的共产主义：历史和解释》与《逃往俄国：奥托·W. 库西南的

政治传记》。

季米特里·基齐基斯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出生于雅典，在索邦受教育，他曾是好几个欧洲著名学术中心的接受奖学金的研究生。他的著作有《宣传与国际政治的影响——1919—1920 希腊和她向巴黎和会的请求》等

欧塞比奥·M. 穆哈尔—莱翁是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政治学的博士候选人。他曾为几家杂志和专题论丛写过关于伊比利亚政治的文章，1977年在马德里研究西班牙共产党。

戴维·林恩·普赖斯是以英国问题为主的顾问和政治分析家。他发表过关于中东的主题广泛的著作，但多年来也密切注意英国共产党的活动。有关后一个题材的文章发表在诸如斯坦福大学胡佛学会出版的关于战争、革命与和平的《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这类刊物上。

贾科莫·萨尼是哥伦布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出生在意大利，曾写过大量有关意大利政治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文章。他特别致力于分析群众政治。

导 言

戴维·E.奥尔布赖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几年里，西方分析家普遍认为西欧共产主义基本上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大。他们虽然承认西欧党力图利用本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有几个国家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仍然把这些党看成仅仅具有狭隘的表面的民族性而已。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党是执行莫斯科意志的工具，顽固地破坏西欧各国现存制度的各方面，并且执意不肯与当地社会和政治相结合。^①

然而，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日益分化的迹象，尤其是中苏分歧引起的混乱，促使上述看法的转变。大多数分析家现在要设法估价这些西欧党对于苏联党有多大程度的独立，以及随之产生的在欧洲范围出现的多元化的程度如何。^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的看法含蓄地暗示对一种原来观点的重新肯定，因为早就有过广泛传布的信念，即西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纽带的松散，可能意味着西欧党回头向左翼社会民主党发展。一位欧洲形势的权威观察家甚至预言说：“今后五年，不当权的共产党除了名义上与两次大战间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不同外，毫无疑问实质与它们完全一样，尽管他们可能不必担心，1961年以后出现的

^① 例如见马里奥·艾瑞迪，琼-马里·多米纳奇，奥尔多·加罗斯西：《西欧共产主义》，纽约1951年；弗兰克·博凯瑞：《欧洲共产主义》纽约兄弟公司，1953年。

^② 有代表性的见解，见亚历山大·达林，乔纳森·哈里斯与格·霍内特合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变化》，纽约1963年；威廉·格里菲思编：《欧洲共产主义》，两卷，马萨诸塞1964—1966年。

斯大林主义亲中国派会变成巨大的党派。”^①

以上两种看法在已往几年里不问其价值如何，近来的形势发展表明两者都没有恰当地反映出西欧共产主义的真实面貌。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紧张，但是根本不能肯定，这两个党正在演变为社会民主党。虽然两者都打算保持广大群众的支持，意共甚至还扩大它的群众基础。两党似乎在向参加本国政府迈进。确实意共虽然在内阁中没有代表，自从1976年8月以来，它对意大利国家政策，发挥了实质性的影响。因为至少它在议会里的间接支持，对政府的组成与存在具有至为重要的作用。在国家面临的紧要问题上，它有一定发言权。另一方面，与苏联共产党密切联系，并不妨碍有些西欧党在本国内部取得重大成功。例如，忠实于苏联的葡共，在1975年4月葡萄牙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获得近13%的选票，在1974—1975年的内阁中持有许多职位。虽然因为牵涉到1975年11月份发生的流产政变，削弱了葡共的地位，但是它显示出依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76年议会选举中它赢得15%的选票，1976年又巩固了对葡萄牙工人运动的领导。

总之，对西欧共产主义问题需要有新的看法。本书的意图就在于满足这个需要。^② 本书通过西欧共产党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中

^① R. V. 伯克斯编：《共产主义的未来》中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变质》一文，底特律1968年，第238页。其他著名评论家的同样说法，见理查德·洛温撒尔：《世界共产主义：世俗信仰的瓦解》，纽约1964年，第267页；威廉·格里菲思：《1965年的欧洲共产主义》，载于《欧洲共产主义》第2卷，第7、25页。

^② 在这个问题较早做过同样努力的有罗纳德·蒂尔斯基：《1920—1972年法国共产主义》，纽约1974年；唐纳德·布莱克纳和西德尼·塔罗合编：《法国和意大利共产主义》，新泽西1976年。如同题目指明那样，这些文章只讨论法、意共产主义。尼尔·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伦敦1975年，其中有许多有用资料，可是它仅仅叙述各党情况及其观点，没有谈到这些党与它们四周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

所发挥的作用,对它进行分析。^①本书用八个章节分析比较重要和比较非正统的那些党,最后一章探索各党与它们国内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党之间关系的影响。导言试图提供总的概念,为以下各章的分析建立一个大概的框架。在导言中还将简要提到不在以后各章节中讨论的一些党派。^②

首先必须知道,共产党在其活动的政治制度中的作用,取决于若干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是社会和政体的实际情况为党提供的各种机会。这些机会来自各种不同的因素,但主要应考虑的是国内客观社会和经济情况,以及人民群众对这些情况的态度;本国的政治历史和传统;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布局;和各派政治力量对共产党的态度。第二个因素是党本身所具有的形象,和力图在别人心目中造成的印象。尽管对苏联和苏共的态度是决定党自身象形的条件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一个,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条件。此外如本民族的激进传统和某一领导人的个人历史,也都是决定象形的条件。最后,还有党的策略问题。策略是在党对付大量紧急问题时产生的。党应该向哪一部分社会力量做工作?党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参加议会政治?参加议会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党应该联合哪些政治力量,目的何在?党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参加政府?等等。

因为这些因素中包含许多可变因素,因为这些可变因素的不

① 为了不发生任何误解,必须澄清“作用”一词在这个地方和整本书中的含义。首先说明,这个词基本上是形容性质的,并不是指结构机能分析学派所规定的维持政府所必要的规则。其次这个词的含义指党与制度的能动关系,而不是指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关系。最后它意指复杂的现实,意味着几种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机能类型的混合,如反主流文化的机能和执政党的机能。

② 本书探讨的目标,我曾把西欧地区限于欧洲大陆上非共产主义国家和与欧洲关系密切的一些岛屿。从东北部芬兰以反时针方向到东南部的希腊。应该注意的是,这个限定与1967年和1976年欧洲共产主义会议不完全一致,因为这个会议邀请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而大多数分析家的看法,这两个国家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中东,不应属于西欧。当然,如同季米特里·基齐基斯在本书论希腊共产主义运动那章提出那样,似乎可以把对希腊的分析包括在内。

同而产生的具体情况也就随着千变万化，所以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每个西欧共产党在各自政治制度里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因之，凡是能够有意义地普及到整个地区的党的作用，大部分与形成这些作用的因素有关。就是此种普及化，值得我们首先加以注意。

机 会

考虑到西欧共产党所遇到的机会产生于各种不同的条件，让我们简短地查看一下从一个地方看来为最中肯条件所产生的影响。总的说来，西欧各国的民族和语言特性给共产党加以利用的机会不多，因为大多数国家在这两点上有很大的一致性。但是，有五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的国家：比利时、英国、马耳他、西班牙和瑞士。在比利时，佛兰芒人占总人口 55%；操法语的瓦龙人占 33%；混血儿或其他种族的人占 12%。在英国，虽然 83% 的英国人是英格兰血统，但是 9% 是苏格兰血统，5% 是威尔士血统，3% 是爱尔兰血统。马耳他居民的种族十分复杂，包括阿拉伯人、西西里人、诺尔曼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虽然西班牙居民中 70% 以上讲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但是其余部分的人操各地方言。具体地说，17% 讲卡塔兰语；7% 讲加利西亚语；2% 讲巴斯克语。在瑞士当地居民中，有 74% 德国人，20% 法国人，10% 意大利人，1% 的人说罗曼语，还有 1% 为“其他”。①*

在这些特殊国家里，马耳他人种最杂，但对该岛的政治来说，这一点并无多大影响，而瑞士长期实行联邦政府，允许每一民族在其集中的地区享受高度的自治权。可是，其他三国在近些年来，那

① 见《1977年7月全国基本情报知识手册》（华盛顿中央情报局1977年8月）。这个文件是一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半年刊物。可向国会图书馆文件分发计划处查阅。

* 百分比有误。——译者

些感到自己在中央政府中没有足够的代表的民族日益强烈要求区域自治。在比利时,这种呼声主要来自佛兰芒人;在英国和西班牙则来自少数民族。此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抵触情绪,使决心改造现存政治制度的政党中的不满现状的团体,增加了潜在的吸引力。

宗教上的不同也没有为许多共产党提供作为政治资本的根据。当然,大多数共产党在企图利用这种机会时,因为他们强烈主张无神论,要碰到许多困难。但是无论如何,有少数西欧国家里,宗教冲突已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即使是潜在的)。除西德、英国、荷兰和瑞士以外,每一国家都只有一个宗教团体享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西德、荷兰和瑞士,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在当地居民中有大致相等的教徒,而在英国,新教徒占支配地位,天主教构成强有力的少数。^①只有在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在政治上的关键时刻,宗教作用才真正地、隐约地显示出来,即使在这种时刻,宗教问题还是和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

社会职业地位本来是共产党可以利用主要机会,如今在整个地区,其重要性越来越小。许多西欧社会一直在职业地位上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经济发展的步伐把分隔的鸿沟填平了许多,因为经济飞速发展促使这个地区社会地位的急速变动。这种变动的最突出的证据就是从事农业劳动力的百分比剧烈下降。战前资料有案可稽的十三个国家中,战争结束以来农业劳动力降低于10%的只有英国,英国下降6%,这个数字反映出早在战前英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已经很少。至于其余各国下降的比例,比利时为12%,芬兰为37%。^②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从体力工作到非体力工

^① 同上页注。

^② 1945年前的资料,见联合国《1948年统计年鉴》,纽约1949年,第240—251页。资料都是绝对数字,由本人算出百分比。1970年资料(即最后数字),见世界银行《1976世界年报》,巴尔的摩1976年。

作变动的数字，进一步说明社会正处于不断变动的情景。虽然上边的数字比起八个国家在战后年份里农民转为工人或白领职业的资料来，既不够全面又有点过时，那个资料指明变动率从1963—1964意大利的17.1%到1950年瑞典的27.4%。^①

从另一方面看，经济条件似乎提供了许多良好的机会，在对这个问题估价时，必须把北欧，即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与南欧，即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区分开来。

北欧各国，除了爱尔兰和地处边缘的冰岛以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有了高水平的工业化，恢复了战争破坏以后，这些国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又经历了重大的经济发展。结果是到七十年代中期，除了奥地利、英国、冰岛和爱尔兰外，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都达到5000—6000美元。奥地利和冰岛大约4500美元；英国3500美元多一点。只有爱尔兰数字相当低，只有2000美元出点头。^②重要的是，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已经缩小。的确，有证据表明除西德外这个地区所有国家，比起其他地区经济发达的国家来，收入的分配比较平等。^③最后，北欧地区许多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里建立福利国家，那些福利较落后的国家也很快采取有效措施，旨在救济处在经济上困难的人们。凡此种种，其目的都在于缩小这个地区的经济差距，或者至少能起缓和作用。事实上，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在北欧地区，有关经济上的不满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和工业化对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有害影响和福利国家的沉重负担。^④

① 见沃·康纳：《社会主义、政治和平等》，纽约即将出版，第四章的数据的介绍和讨论。各国包括丹麦、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和西德。大部分研究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进行的。

② 联合国《1976统计年鉴》，纽约1977年，第691页。

③ 见马·索耶：《经济展望》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收入的分配”，巴黎1976年7月，第16—17页。

④ 见本书有关章节和每年出版的《世界政治手册》，由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出版。

地中海沿岸欧洲部分,情况完全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几个国家刚刚开始工业化,其余国家只有局部或有限的一点工业。虽然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可是到七十年代中期,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和西班牙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仍然没有超出 1000—2500 美元。只有法国超过 5500 美元,达到北欧的水平。^①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贫富悬殊的情况虽然有一定程度缩小,但是几乎到处仍然十分严重。法国、西班牙也许还有希腊,贫富鸿沟分外明显。^②政府没有重大的计划来改善处于经济阶梯最低级人们的景况,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有些国家富人逃税,遗产税收得低,给有钱人种种好处,使这些分裂更加扩大,因为这些情况意味着政府从所得税抽来的收入中,白领和产业工人负担了大部分份额。^③

尽管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基本经济形势有所不同,但在七十年代中期两个地区经历了共同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加剧了整个西欧潜在的经济冲突。痛苦的原因是落在西欧头上的重大经济衰退——当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遇到同样的衰退——而经济衰退是跟着 1973 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和随后产油国决定将原油价提高三倍来到的。根据各国官方数字,除希腊、马耳他、挪威、西班牙和瑞典外,所有西欧国家在 1975 年都出现负数的增长率。虽然每个国家在 1976 年实际上恢复增长率的正值,但是英国、芬兰、冰岛、

① 联合国《1976 统计年鉴》,第 691 页。

② 索耶:《收入分配》,第 16—17 页。

③ 见本书有关章节。萨比诺·阿奎维瓦与马里奥·桑图西奥:《意大利社会结构》,科罗拉多 1976 年。杰奎琳·格雷平、斯坦利·迈斯勒、吉姆·霍格兰的文章,见《华盛顿邮报》1977 年 7 月 17 日、8 月 24 日、10 月 23 日。雅典议会上希腊反对党领袖声明和政府的回答,1977 年 12 月 25 日,据“国外广播新闻节目”《每日报告:西欧》,华盛顿 1977 年 12 月 28 日。西班牙总理阿多尔福·苏亚雷斯在 1978 年 2 月 4 日报告,1978 年 2 月 5 日西班牙马德里电台报导,据“国外广播新闻节目”《每日报告:西欧》,1978 年 2 月 9 日。

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经济，依然是一片萧条景象，增长率不到2%。^①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和失业达到战后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1975年消费品价格上涨的百分数，从西德的6%到冰岛惊人的48.9%。^②从此以后，只有象瑞士、西德、英国和冰岛几个国家曾经在降低物价上升率上取得某些进展，大多数国家只能维持原状，或者眼睁睁看其飞腾，束手无策。^③至于失业问题，只有卢森堡、瑞士、挪威和瑞典在1975年末失业率低于2%，而葡萄牙的失业率达到15%，居于首位。同时，大多数国家在1976年基本上保持同上年一样的数字，有的还要上升一点。只有丹麦、西德、希腊、马耳他和瑞典失业数字总算勉强地降下一点。^④

西欧各国之间政治历史和传统，可以看得出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因素，这些因素对共产党来说，既是有利条件，又起遏制作用。在好些国家里，某一阶层居民或某一地区居民具有激进的传统，这些传统使他们特别容易接受共产党的吸引。最有力的例子就是芬兰、瑞典和挪威的遥远北边“荒野”部分，冰岛东海岸和北海岸的小渔村，葡萄牙南部阿连特约农村，和意大利中部的农村地区。另外也很重要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人中的无政府主义传统。^⑤

① 见联合国《1975年世界经济概览》附录第70页；《国际经济概览》，《纽约时报》，1976年1月30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77年7月。

② 《1975年世界经济概览》附录第71页。

③ 见本书有关章节；《纽约时报：国际经济概览》，1977年1月30日；《纽约时报》，1978年1月21日；《华盛顿邮报》，1977年7月16日，8月24日，10月16日，11月27日，12月20日和1978年1月13日；理查德·斯塔塔尔编：《1977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报》，斯坦福1977年。

④ 联合国《每月统计公报》，纽约1977年12月；《1977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报》。

⑤ 例如，见本书有关章节；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蒂尔斯基：《1920—1972法国共产党》；西·塔罗：《意大利和法国共产主义：适应和变化》，见布莱克默与塔罗：《意大利和法国共产主义》，第575—640页；《意大利共产主义社会学》（巴黎1974年；罗·菲尔兹：《葡萄牙革命和武装力量运动》，纽约1976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报》各期，胡佛学会出版社。